

这部引人入胜的自传讲述了一位知识女性跨越阶级和种族的界限去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的故事。

Living for Change: An Autobiography

Grace Lee Boggs

为改变而生活

格蕾斯·利·博格斯自传

[美] 格蕾斯·利·博格斯 著 向穆 译

CP 中国电影出版社

Living for Change: An Autobiography
Grace Lee Boggs

为改变而生活

格蕾斯·利·博格斯自传

[美] 格蕾斯·利·博格斯 著
向 穆 译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改变而生活:格蕾斯·利·博格斯自传/(美)
博格斯(Boggs, G. L.)著;向穆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106-03692-8

I. ①为… II. ①博…②向… III. ①博格斯,
G. L. —自传 IV. ①K83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6890号

原版书名: Living for Change: An Autobiography, by Grace Lee Boggs

本书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所有权利专有。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 S. A.

Copyright© 1998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图字:01-2013-0863

为改变而生活:格蕾斯·利·博格斯自传

格蕾斯·利·博格斯 著 向穆译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13

电话: 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692-8/K·0159

定 价 35.00元

中文版序

骆晓戈

《为改变而生活：格蕾斯·利·博格斯自传》(Living for Change: An Autobiography, by Grace Lee Boggs) (以下简称《为改变而生活》) 真实记录了她的一生。格蕾斯是一位 1915 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她有两个名字——格蕾斯和陈玉平，由于中文版保留原著的著作人署名和书名，书中的他称和自称都用了格蕾斯，为尊重原著与版权起见，我们沿用原作者格蕾斯这个名字。她的自传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记录，生动地展现了杰出华裔女性对历史变革的参与和推动。

在 20 世纪的美国，公民权利运动与美国各项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对美国社会影响深刻。从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我们更能够看到民权运动对美国曾经有过的种族歧视的摧枯拉朽的革命意义。然而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发展的呢？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非洲裔美国人，是如何从毫无权利和资源的底层社会走向政治舞台的？在履行公民的社会责任、义务，争取合法权利的同时，怎样与自身的各种局限进行斗争的？格蕾斯写道：“如果你不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那么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只有能够与自己的弱点进行斗争的人，才能领导并建立新的、更具有人性的社会。格蕾斯本人的人生境界清晰地表现在她一生对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

各种社会界限和壁垒的突破：一位中产家庭背景的华裔女博士进入工人社区从事社会运动；与一位黑人工人结合，携手领导民权运动、社区重建运动；与非洲拉美活动家一起从事跨国界的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等等。

今天，无数的炎黄子孙到大洋彼岸深造，很多美国青年到中国来求学工作，那么读读中文版的格蕾斯自传《为改变而生活》开卷有益。《为改变而生活》一书是美国高校课堂上关于美国历史的常用教材，本书独特的魅力在于，以格蕾斯传奇的一生为线索，记录的却是一部活生生的美国现代史。这部传记从独特的视角描绘出这位华裔女性社会活动家的人生故事，这使得我们中国读者更有一种置身于美国当代历史变革之中的体验。

2004 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妇女研究系王政教授来湖南讲学，向我介绍了著名亚裔女权运动领袖人物格蕾斯。

2006 年 11 月，我到美国探亲，与王政通电话，听说格蕾斯 90 高龄仍然在高校讲座、做社区工作，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出行之前，并没有想到拜访她。我以为高龄的老人已经不便打扰。我在密歇根大学访问期间，王政安排了我们到格蕾斯的拜访，并安排研究生李旭陪同我们。

当我们到达格蕾斯的住地后，放下行囊，我们没有先进格蕾斯的家，仅仅和格蕾斯见面，互相问候之后便换乘 S. K. (Scott S. Kurashige 教授姓名的缩写) 教授的车。密歇根大学的 S. K. 教授研究美国文化和历史，是一位美籍日裔，王政教授委托他在底特律接待我们。

进入城区，S. K. 教授驾车行驶在林荫道，隔着湖，他告诉我们，湖的对岸便是加拿大了。

S. K. 教授也坚持认为，要读懂格蕾斯，应当首先了解底特律。

我对于教授这种重实证研究的态度非常认同。记得王政教授在电话里还强调,如果不懂得美国当代史,不了解底特律,就很难了解格雷斯。

为了读懂格雷斯,我们的阅读就顺着这一条条街道开始:一个个门牌号码,一处处的店铺,一丛丛脱去绿叶的农作物……少女妈妈学校是利用一片废弃的空地建立的一个动物饲养场。阳光下,被圈起来的草地上有马、绵羊,还有正在吃草的奶羊。S. K. 教授告诉我们,通过上实践课,让少女妈妈在观察动物和喂养动物的过程中找回母爱和亲情,培养社会责任感,学会与自己的孩子建立母子情。学会爱,是这一所学校的主题。在这个城市中的动物园旁边有两座很不起眼的旧房子,S. K. 教授告诉我们,这些是教学楼和宿舍楼,少女妈妈正在上课,我们不便打扰。我们在底特律市这样走马观花,算是对格瑞斯的写作、社区行动和学术研究有了直观的感性的认识。S. K. 教授告诉我们,可惜我们是冬天到这里的,要是夏天来,这里的向日葵开得很好。

返回格雷斯的家,S. K. 教授告辞了。我们在格瑞斯的客厅开始了对她的访谈。

我首先告诉格雷斯,我们看到了她和她的团队在底特律的贫困社区所做的种种努力、行动和研究,我们深深地为这种精神所感动。格雷斯指着她面前的一张讲座的宣传单,上面的主题是:“**These are the times to grow our souls.**”(让我们的灵魂成长)。

格雷斯很高兴地告诉我们,昨天她接待了底特律大学的一位华裔女教授,和她交谈了很久。明天她要到密歇根大学去,晚上她在那里有个讲座,主题是:底特律城区的复兴。三十年了,他们夫妇一直在密歇根大学一位教授的课堂上开讲座。这位 90 高龄的老人仍然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和昂扬的斗志,我很感动。

格蕾斯 1937 年大学毕业,在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后,她拎着手提箱到芝加哥工人住宅区参加社会工作,她的选择得到家人的支持。后来她又来到底特律。

格蕾斯接着说,现在她常常到大学和大学生们讲她的这段经历,希望大学生不要总是认为读大学是为了赚钱。读大学应当学会思考,让自己的心灵成长。在后来我们与格蕾斯一块吃饭的时候,她还叮嘱我们对女生的教育中一定要注重让她们学会爱。

我在格蕾斯的家中拍下了杰米·博格斯与格蕾斯夫妇的合影。格蕾斯的丈夫杰米·博格斯是当年南方黑人移民大潮中的一员。杰米·博格斯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在当地的民权运动中十分有影响的。当时底特律的工人运动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杰米·博格斯还与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书信往来。在他们夫妇的合影旁边,是毛泽东的油画以及在 20 世纪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一张照片:毛泽东在飞机上办公的工作照。据 S. K. 教授的介绍,底特律的汽车工会是那个时代美国工人运动的火车头。

从 2006 年访问格蕾斯,到《为改变而生活》中文版付梓,走过了六个年头。其间湖南商学院女性研究中心项目(向穆)组集体承担此书的翻译工作,我负责项目统筹。

此书的出版首先得到了原著作者格蕾斯的热情支持,得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出版社的中文版权授权和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得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研究学者王政教授的支持。正是在王政教授、Scott S. Kurashige 教授和翻译李旭的帮助下,我们得以访谈格蕾斯并商量出版中文版的相关事宜。感谢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文化教育项目的资助,感谢我的年轻的项目合作朋友:湖南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刘彬副教授以及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妇女史学博士林存秀,她们为原稿担任翻译与校对。感谢我的家

人,是我丈夫协同我一道访问格蕾斯并拍摄照片,女儿胡岸子也在其间协助原著翻译工作。感谢项目助理阳兰华、陈征男,编务汪婕。

在《为改变而生活》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尤其欣慰的是格蕾斯/陈玉平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她的自传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同时我们又有几分忐忑不安,尽管我们努力以极大的热情和忘我劳作投入翻译工作,但是我们的学识有限,缺点和不足之处很多,还恳请读者、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2013 年 2 月 23 日

定稿于长沙大学 学府华庭

前言

奥西·戴维斯

生活的道路是充满荆棘的。和多数愿意终生做学生的人一样,我总是需要帮助。我时常感到自己的逻辑是那样地站不住脚;做的结论往往也会误入歧途;我所看到真实总是会有假象。当需要理清思维、解决困惑的时候,我就会去杰米和格蕾斯那里。他们总是能思如泉涌,并且愉快地与我分享。而就我而言,总是能学到新东西。这本书也不例外。拜读之后让我收获不少。

对于那些饥渴的心灵,它不仅是一场盛宴、一剂灵丹妙药,而且是一位雄辩的演讲者在讲述她的故事,让人感觉到似乎一次曙光之旅开始了。你可以听到格蕾斯的声音,同时也可以听到杰米的声音,若不是偶尔的炮弹声,它永远不会间断。时间永远不会停止,我们这两位良师益友也从未停止过他们的工作和追求。这本书记录了他们不断追求、成长的过程。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就像是鲜花向往阳光、猎人追捕猎物一样地执著,不论他们发现什么,他们都会乐于与人分享。

这本书讲述了事业、集会、冲突、运动,以及发起运动的男人和女人们:工人、学生和人民委员会;C. L. R. 詹姆斯、克拉格神父、富兰克林神父、科尔曼·杨、马尔科姆和马丁;艺术家、音乐家、诗人、演员、罢工者、革命的追求者;他们双方的家庭成员;和格蕾斯一样

热情洋溢的杰米：他的精力、他的紧迫感、他的献身精神、他的诚实和耐心，当然有时他也是极度缺乏耐心的。

格蕾斯，格蕾斯，格蕾斯，她的精神和她的生活方式如同钢铁一般的坚强，但又是那样地容易相处，那样地平易近人。她将我们带到了她过去隐秘的私人生活，宛如一位旁观者在讲述家庭、书籍、学习和斗争的故事，她尽量地保持一种“自然的语气”，而决不矫揉造作。她最终回到了中国，找到了在“斗争”中最终的公民身份，她确切的定位。她的归属就是与所有的“人民”站在一起。成长、变化、发展，快得就像每天的头条新闻一样，但一直保持着稳定——我要再次说——这无疑是有利于实现目标和提供指导的，就像丽雅特·塔布曼的故事和北极星一样。驶向过去，探索未来。此书就是这位飞行者的日志。

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总是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当她谈起他们时，尤其是杰米和他的去世，眼前总是浮现她的面容。仿佛作者在发现读者为之啜泣时，总是会转换话题，稍作停顿，直到他或她停止啜泣，然后又重新讲述——讲述她的故事，教会你生活，直到最后一页。

玉平

我觉得自己生为一位美籍华人女性是非常幸运的,我有两个名字:格蕾斯和玉平。如果我不是女性,也不是美籍华人的话,就不会这么早地认识到社会需要彻底的改变。如果我不是女性,也不是美籍华人的话,很有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大学哲学教师,一位观察者,而不会积极参与到 20 世纪后半期的能升华人性的运动中去。

我从未想过会写自传。直到 1994 年春,劳伦斯·希尔书社的雪利·克罗伊斯向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当时我的回答是我宁愿继续参与到那些创建运动的活动中去。

那时,杰米去世不到一年,而我还在努力地思考靠我自己可做的事情,或者说,是否还有“我自己”。当你失去的一个与你共同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人,这种事情会常常发生。尤其是当你是位女人,你需要时间去重塑自己、发现自己。而我,这种需要尤为迫切,因为在与杰米结婚后的四十年里,黑人运动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运动。所以,我的身份认同很大部分来自于杰米,以至于在 FBI 的很多备案中将我描述为非籍华人。

杰米去世后的三年里,通过积极参与底特律重建运动,我又重新找到了自己。当我逐渐相信自己有能力作出决定的同时,也更加对发现自己的历史感兴趣。

写这本书让我从自身学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例如,我发现自己不屈从的性格是受到母亲的影响。而在她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我和她变得非常疏远。我还发现,自己反对受害者心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曾让母亲的生活变得如此糟糕,最终导致我们之间的疏远。

我认为自己嫁给杰米的主要原因是我需要完整。当我们在1952年相遇时,我是一个来自美籍华人中产阶级家庭的都市女孩。尽管参加激进运动已有十几年的时间,甚至在“二战”期间还在一个军工厂工作过,那时的我基本上还只能算是个名牌女子学院的产品,一位纽约知识分子。我对革命斗争的理解主要来自于书本。杰米在阿拉巴马的一个小镇出生、长大,那里的街道上只有两三个商店。虽然在底特律生活、工作了十五年,但他仍然是人们常常开玩笑说的那种“你可以把他带离农村,但不可能将农村从他身上带走”的人。我喜欢用手做的事情就是让文字在键盘上跳跃。他也喜欢写作,而且常常可以在短短几分钟之内给编辑写一篇文章或一封信,但在多数时间里,他总是用他的那双手去做一些体力活,在车篷盖下修车或在房屋周围修修补补。我是美籍华人,是美国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数少得几乎可以忽视它的存在。他是非裔美籍人,他非常清楚正是他祖先们的血汗才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且他已经开始为他们能够拥有参与决定这个国家经济、政治的未来而进行着斗争。

婚后十年里,杰米第一本书,《美国革命:一位美国黑人工人的笔记》(以下称为《美国革命》)出版了。让我们惊讶的是,这本书

给我们带来了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祝贺信，杰米毫不犹豫地给这位在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西方最有名的哲学家上了一堂课。杰米对他非常尊重，但同时非常直接而坚定地指出，罗素忽视了美国当前进行的革命斗争。在他给《美国革命》所写的序中提到，“我是一个工厂工人，但我知道的不仅是工厂里的工作。我知道，一个生活在由逻辑能力强的人构成的社会中的社会人，他听到的正确的事情与其在由真实的各色人群构成的社会中的客观存在是不同的”。

我相信，讲述两位拥有如此不同背景的人，杰米和我，能够走在一起，并一起享受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故事对其他美国人是有指导作用的，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构成正迅速发生着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进入这个国家的移民中多数人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尤其是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在一些城市里，西班牙人和亚洲人已经成为主体。人们都认为，在21世纪中叶，欧洲人和非裔美籍人将成为美国人口主体中众多少数民族的一部分。在这种新格局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新的压力和紧张形势。如果新移民被看成是一种威胁，那么这些压力和紧张形势就会爆发，就如同1992年在洛杉矶中南部爆发的那场暴乱一样。另一方面，如果老一代的移民——除了美国本土人，我们通过机遇或由于亲属关系的原因已经移民到这个国家——能够认识到，就是靠这些人的支持我们的生活才会得到改善，就是靠这些人我们才能完整，我们要一起开始一场斗争，让美国成为人们希望的那样——一个所有人可以不分民族、骄傲地成为自己的国家。

这本书不仅仅是我的自传。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杰米的传记。在介绍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时，我有意专注于体现他的力量。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位圣人，而是因为我已经其他人的身上

找到了这种力量。和杰米一样,这些人也许看上去非常普通,但是当他们的从艰难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并获得知识之后,就会像杰米一样,认识到他们的斗争不仅拯救了自己而且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的发展。他们是无价的资源。我希望通过对这些品质的强调让更多人了解他们,并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我也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讲述 C. L. R. 詹姆斯,我从 1942 年到 1962 年间一直和詹姆斯在一起工作。自他在 1989 年去世(享年 88 岁)以后,讲述、描写这位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智慧的人的文章和书有如潮涌般地大量出版。这些出版物的多数作者了解的只是正在走下坡路的詹姆斯,那时他正忙于环球旅行,而且在 60 年代初,他遭遇了一次几乎让他丧命的车祸。他仍然非常聪明,但这绝不是老年的他。那时,他自然而然获得的力量在不断地膨胀。因为他的生活和“约翰逊—福里斯特派”成员的生活完全缠结在一起,所以很自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詹姆斯的传记作家和批评家们越来越不注重一手材料,尤其是不再关注他初来美国的经历了。而那个时候正是他最多产的几年。1962 年我们分道扬镳,但我非常珍惜与他在一起工作的那些日子,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逐渐认识到,革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飞跃。

和詹姆斯工作时,我有机会结识一些第三世界独立斗争的卓越领导者。其中,克瓦米·恩克鲁玛成为“二战”后第一个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加纳的第一任总统。1945 年纽约,我们初次见面。那时的他刚刚结束在林肯大学的学习,准备回到当时被称为“黄金海岸”的地方,参加独立战争。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1968 年。1966 年政变之后,他被放逐他国。在我们为刚结束最后一周的讨论而相互祝酒时,恩克鲁玛对杰米说,“我希望你别介意我要说的,

如果格蕾斯嫁给了我,我们一起就能改变整个非洲”。这句话在我看来正是那个鲁莽时期的一个典型例子。

杰米总是提醒我们,我们只是无名小卒:“任何人只有与其他人或者更多大人物相联时才算是个人物。不要把你自己就是个人物这种想法放在你那糟糕的心灵里。”在这些篇章中,除了我的家庭、杰米和 C. L. R. 詹姆斯,你会遇到更多的影响了我一生的人:像莱曼·潘恩和弗莱蒂·潘恩、平·范瑞和卡罗尔·范瑞、吉姆·杰克逊、奥西·戴维斯和鲁比·迪、罗斯玛丽和文森特·哈丁、凯瑟琳·高·艾伯利、曾仲鲁(路易斯·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和他们交换、拓展我的思想;另外,像克莱蒙逊·巴菲尔德、多萝西·加纳、约翰·格鲁查拉、杰拉尔德·海尔斯顿、谢·豪威尔、罗马·梅菲尔德、多尼尔·威尔金斯和恩肯其·左拉这些我们在每日底特律公民化斗争中的同志。我希望能写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写我自己并非易事。尽管在许多方面,我更像个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但在中国家庭长大的我已经习惯将自己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独立的个体。例如,在 6 岁的时候,同胞姐妹们和我都在医院里切除我们的扁桃体。我是最后一个醒来的人。在美国护士和医生都围着我的床边观察时,我醒来的第一句话说的是“其他人怎么样了”,当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作为唯一一个参加政治会议的美籍华人,我尽量地不去关注自己,而且当被点名表扬时,亦掩饰不住那份尴尬。20 世纪 60 年代骚乱时期,人们常常拿我的“无名氏情结”开玩笑。这种自我谦避的习惯在本书初稿中就体现出来了,但那份草稿却被严厉地批评为缺乏“主体性”。我非常感激斯坦利·阿罗诺维茨比较含蓄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作为明尼苏达州大学出版社编审人,他在评论中写道:“当杰米去世后,格蕾斯第一次要独自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们深信,直到

那时,她才去考虑她自己。”这句话才真正触到了我的内心。

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每一位在明尼苏达州大学出版社工作或有联系的人都非常合作。尤其要感谢我的编辑米凯·克里特,尽管初稿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从一开始就不断地鼓励我,并提出了许多建议。编审人俄勒冈大学克里斯托弗·菲尔普斯教授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初稿,他对稿件做了详细的修改和建议。明尼苏达州大学奥格斯特·尼姆兹教授提出的建议也非常有帮助。出版编辑路易莎·卡斯勒,对稿件的成稿做了最后的修改。编辑助理珍妮弗·摩尔自始至终非常耐心地修改稿件的细节问题。我的朋友、同事迈克尔·布朗、艾逊·陈、里克·费尔德曼、谢·豪威尔、吉姆·杰克逊、爱丽丝·珍妮斯、格温·柯克、泽维尔·尼古拉斯、弗莱缔·潘恩、彼得·普特南、弗朗西斯·瑞德等,都参与了出版之前的几次改稿工作。

在日内瓦的路易斯·曾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里摘录了一段他在1996年5月22日来信中的话:

在我看来,格蕾斯·博格斯已经成为了一个意志力坚强、热情洋溢的人。格蕾斯告别了过去的她,并闯入了一个新领域。她是位女性,却闯入了男人的领域;她是一个华人,却闯入了黑人社区;她是位知识分子,却闯入了工人的领域。称她为“革命家”再合适不过了,革命是她一直参与,且从未中断过的事业。给她冠以“唯意志主义论者”、“超然”的头衔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她对任何现存物质或其他的东西没有任何的耐心,并总是坚持要超越现实的局限性。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从毛泽东的身上找到了家族精神。没有耐心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星期天,每次和弟弟埃迪一起吃晚饭时,我们总是在一起回忆过去,不过意见很少一致过,但如果你是八十几岁的人,能够一起讨论过去六七十年里所发生的事的人可以说是少得可怜,所以每个人都是值得珍视的。

好友、同志爱丽丝·珍妮斯和卡尔·爱德华,他们急切盼望本书的出版。这一直对我是种鼓励。同时,他们将办公室里的传真机、复印机等设备提供给我。这里,我还要特别感激布伦达·伯易德、瑞纳伊·米格龙·格里芬、克拉·瑞德弗德以及特洛伊·塔图姆等人,感谢他们耐心地为我传真来信以及清理复印机。

马丁·格莱博曼帮助我核对本书中提及的所有日期和人物,当我打电话问问题或借书时,他总是非常热情地为我提供帮助。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持不同政见的同志之间应该怎样相互帮助。如果没有底特律韦恩州州立大学劳工和城市事物档案馆里那些图书馆管理员们的帮助,这个工作将会是无法想象的。

最后,我要感激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的基因,我能够在经历了大半个 20 世纪之后,依然还能积极参与到梦想 21 世纪的活动中去。

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让我在这些年里一直这样执著地工作。我想,这是因为斗争永远不会结束。不论赢还是输,每一场斗争都会带来新的矛盾,更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正如在一首爱丽丝·沃克的诗中写到的那样(我最喜欢的一首):

我一定是非常爱这些问题

它们本身

正如瑞克说的

就像一间上了锁的房子